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文化

——广东文化建设实践扫描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广东文化建设实践扫描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3·广州

粤新登字 13 号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广东文化建设实践扫描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州 石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水电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85 字数：10.5 万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81029-189-0

G·23 定价：3.80 元

前 言

马列主义是不断发展而充满生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新贡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全方位的，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自然包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是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的。

作为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和前沿地带，广东省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也作了一些探索和试验性的实践。

本书新辑的十多篇文章，就是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试图把广东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和经验教训，提升到理论的层面和高度加以评析和总结。有的是从文化领导部门的角度，去回顾和探究改革开放中文化建设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和办法；有的是从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基点去观照、剖析、探讨广东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象和问题，并提出一些构想和建议；有的是在社会文化调查研究中受到感悟，在热情肯定和赞美这些新的探索举措和新的文化景观的同时，还试图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和总结。目的都是为广东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热潮，推波

助澜，扩展声势。

理论常常落后于实践，这是客观规律。广东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是一日千里，飞跃向前的，当上述的文章结集出版之时，广东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潮又向前奔涌了一大段流程了。因此，本书新收辑的文章，只能看作是广东文化建设新潮初始阶段简略的反映、初步的探讨，作为历史进程的纪录，迈向未来的足印，希望在未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对读者有所助益。

编 者

1993. 10. 31

目 录

前 言.....	(1)
文化建设话“务虚”	阮纪正 (1)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思考.....	张 绰 (16)
市场经济时代的文艺使命.....	单世联 (36)
市场经济引向文艺的思考.....	唐 瑜 (52)
对文艺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	何 慧 (61)
珠江三角洲的对外开放与我国的文化建设.....	赖伯疆 (68)
珠江文化繁荣论	
——关于开放、繁荣珠江文化市场的构想	柯 可 (80)
珠江三角洲群众文化建设探究.....	林 琼 (95)
顺德文化事业发展的成就特色和启迪	许志远 (107)
特区文化管窥	黄承基 (117)
他们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来自湛江的报告	贺 朗 (128)
关于建设华南现代文化的若干思考	许翼心 (142)

文化建设话“务虚”

阮纪正

笔者所理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指以中华民族为主体、以社会主义为本质的现代形态文化建设。它是我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方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背景下的充分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转型。其核心部分，当我们民族精神在当前世界环境中的重构和重组。由此看来，这种文化建设除了要有为我们民族发展准备物质条件的“务实”方面以外，还得要有为这种发展提供精神超越的“务虚”方面。这是两个不可或缺以及不可畸轻畸重的方面。用当前流行的语汇来表述，则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文明”的建设。就文化建设的范围来说，“务虚”方面或曰“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则占据着一个极为突出的位置。

(一)

马克思主义指出，一定的文化形态特别是其中的观念文化形态，其实都是一定经济和政治的表现和结果。离开这一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去空谈文化和观念，那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一定的文化和观念又不能简单

机械地归结为经济和政治的镜像反映，不能抹煞文化和观念跟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不能抹煞文化和观念对经济和政治的能动选择作用。人是理性的生物，观念导向是人类实践跟动物行为的基本区别之一。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观念导向和精神超越的“务虚”方面，使得人类实践可以超越现实而进行创造，把动物的适应环境升华为人类的改造世界。马克思说得好：“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在另一方面说，如果实践成果不能深刻地反映到理论思维中的时候，理论的苍白、浮躁、混乱与矫揉造作就是不可避免的。而后者又必然会加剧实践的盲目性，甚至让实践的结果走向原来愿望的反面。特别是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任何理论虚无主义都是危险而且有害的。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思想理论，而是在于要什么样的思想理论。

当前，我们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要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探寻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必须牢牢地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问题在于任何经济的发展，又都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因而我们应在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历史性演化当中，作出真正自觉而且有效的选择。我们知道，“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根本的思想路线，它本身是完全正确的。而“物质决定意识、实践优于理论”的哲学原理，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但这些东西跟我们那在农业自然经济小生产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求实致用”、“求利致富”、“尚力图强”、“灵活变通”的经世、

致用、事功思潮，事实上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一个农业自然经济小生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把实践局限于个人经验的层次而不能提升到社会历史的高度，还用线性单向的机械方式去把这些个人经验推到极端，那么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确实无法实现对自身的突破和超越。十年浩劫结束后，由于僵化意识形态信条的破灭，人们价值取向多由“虚”转“实”，理想还原为实惠，一种所谓“心往实处想，劲往实处使”的“办实事、得实惠”的功利主义，成了整个社会思潮的主流。就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人们总不能老是在想象中生活，而人类社会也不可能根据某些“先验的”意识形态标签来运转。就这点来说，舆论界对“空谈误国”的警惕和对“实干兴邦”的执着，应是完全合理的。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四个现代化是干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或说出来的。”人总是要干事的，现在问题不在于干不干，而在于怎样干。建国以来我们从来都是强调“大干快上”的。但这“大干快上”的结果，却是把国民经济推到一个崩溃的边缘。

岔子到底出在哪里呢？从文化基因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一种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小生产基础上的实用理性操作型的文化。它提问题的方式，首先是生命体的利害得失，而不是“物自体”的真假对错。它那“黜玄思、务实际”的经世、致用、事功思潮，不但真正源远流长，而且在晚清以来还一直是社会思潮的主流。恩格斯指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李泽厚先生也认为：“中国人的思维乃至中国文化都与实用的东西联系得比较密切。”这种实用事功的倾向，甚至在宗教信仰这个最不实际的

领域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人缺乏西方宗教那种赎罪得救、灵魂飞升、与主同在、获得永生的崇敬心理，也没有印度宗教那种苦修苦炼、精神解脱、跳出轮回涅槃寂静的不懈追求；中国人崇敬神灵，则是非常实际的趋吉避凶、化灾解难、肉体成仙、获利图报。费孝通先生在《美国与美国人》一书中对比东、西方宗教信仰的这种差别时写道：“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象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所以，中国人“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一方面见菩萨就拜，另一方面又不见真神不烧香。灶君老爷上天，人们便塞点麦芽糖给他吃，让他别到天上去胡说八道。总之，中国人极为善于利用神灵和上级。由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便把拉关系、走后门、行贿赂、通关节的世俗行为也称之为“烧香拜神”。这种被外国人视之为“亵渎神灵”的无信仰的操作实用型中国式智慧，造成了我们古代社会的繁荣，但同时也造成了我们近、现代社会的停滞。有人觉得，中国文化的真正特征是“重义轻利”的泛道德主义。它应属于不实用、非功利、反操作的“务虚不务实”。笔者以为，这说法恐怕有点儿倒果为因。中国文化确有泛道德主义的特点。但这个特点恰好又是统治者基于自身利益和维护既定秩序的操作方式。中国传统经济是政治型经济，中国传统政治是伦理型政治，中国传统伦理是宗法型伦理；而这一切，又都恰好是统治者经世、致用、事功的结果，是我们历来如此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内圣外王”操作方式的自然表现。中国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是文化发展轴心时期——“周公维新”路线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

几千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的这种经世、致用、事功的思潮，并没有也不能将我们引入一个新的社会境界。现在人们还要把这种思潮进一步引向急功近利、眼前实惠的短期行为，不见得可以使它增加点什么新的时代内容。时下所谓“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有权不用、过时作废”、“趁机捞它一把、不捞白不捞”等等，更不见得是一个民族上升时应有的心态。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缺乏“纯学术”的理论分析和对“绝对真理”那非功利的执着追求。中国人心目中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并且都是跟人的具体实惠联系起来的。由此，他们很早就倾向于“以虚求实”、“将无为用”。在这里，“虚”是手段，“实”是目的；“无为”的结果是“无不为”。人们活动中往往从一些模糊不清的心理意象出发，用标签或招牌去取代事物的本质，然后运用“挟天子以令诸侯”或“挂羊头来卖狗肉”的方式，去谋求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实惠。而在这个过程中，那种虚幻不实的心理意象和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还有与此相应的种种空话、大话、假话、套话等等，恰好都是为了达到某种具体实惠的“求实”产物。我们现在已经明显地意识到那泛滥成灾的形式主义对我们事业的危害。但在克服时似乎又找不到问题真正关键所在。形式主义之所以长年禁而不止，其实就是那简单的“求实致用”在支撑着的。人们“认认真真搞形式、严严肃肃走过场”的结果，是实实在在、如假包换的名利双收。所谓“图虚名、得实祸”的那个“实祸”，原来是祸人不祸己、祸国不祸身。为了得到实际的利益，中国人很懂得有些问题是“能说不能做”，而另外

的一些问题则是“能做不能说”，由此形成心口背离、言行不一的表演意识、双重人格。随机应付、灵活变通，实际上只是顺应环境而不是改造世界。而他们那不屑于明确理论的“阳奉阴违”和“阴奉阳违”，实际上也只是对现存秩序的反叛而不是超越。这种反叛的结果，则是在“取而代之”以后旧秩序的全盘复活。中国人过于讲求实际，不愿意执着于抽象的理论学术，但这恰好又反过来给我们在实际事务中带来了屡遭失败的苦果。“五四”先哲逐步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企图把经世、致用、事功思潮引向近代启蒙主义，让文化建设从器物层面通过制度层面而最后提升到精神层面，讲究“吾人最后之觉悟”。但这个时代的主题，很快又被实际事务给淹没，人们倾向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少曾领风骚的先进人物，竟不知不觉地又向着最古老的传统复归，而人们对一些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则大都仍然是处于形式模仿、拿来就用的一知半解、若明若暗之中。我们的文化主体，其实并未得到真正的扬弃和新生。

(二)

可以比较一下另一种处理“虚”和“实”的问题的文化方式。西方人历史上具有一种“以实求虚”、“实证推演”的纯粹理性追求，具有强大“形而上”的神学传统，执着于天上而不是地面的“乌托邦”。他们的手段是“实”的，但目的却是“虚”的。他们通过各种具体的实证分析、试验探测、逻辑推演，去追求什么绝对、普遍、纯粹、永恒、真理、正义、不朽、上帝等虚无飘渺的东西。当然，西方社会也有自己的虚伪和奸诈。但他们的工业化过程，却是采用“血与火”的

早期资本主义方式，通过产业革命和经济实力而不是投机取巧和理论标签，从而得到实现的。而且在这个“用实”的过程中，人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理想社会状态的执着追求，并不缺乏反思传统、批判现实的形上超越精神，亦即从来没有放弃过“求虚”的追求。而在这个文化氛围中生长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更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那实践的、科学的本性，跟其批判的、革命的本质本来就是一回事。至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立足于人生和价值，追求效用和成功，突出行为和工具，反对抽象理论和“形而上学”；这看起来跟我们“求实致用”的“实用理性”极为相似。但问题在于美国实用主义是一种关于功用的理论思考，而不单纯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方式。实用主义强调冒险进取、探索创新，这也跟我们随机应付、灵活变通具有不同的品格。实用主义的真理、价值理论，具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和信仰主义特征；而我们的“实用理性”，却往往是“舍己从人”而无信仰的。

世界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是最个人主义的阶级。但他们在创造自己的经济——社会体系时，却并不缺乏真正的牺牲精神和献身行为；商品社会、市场经济是个真正世俗和功利的世界，但它所需要的社会前提和制衡因素，恰好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一类“公理”和“正义”的追求，是公民社会的契约、信用、法治制度。马克思当年曾极为深刻地指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其实都是商品社会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者和所有者头脑中的反映；而韦伯也曾令人信服地分析过，新教伦理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指出：尽丧失了思维批判性和否定性功能的

工具理性，本质就是统治的合理性。它那对现实的顺从态度，使自己成为统治的工具和意识形态。由于工具理性的统治，每一件事物都服从资本力量永恒化，大量生产的文化扼杀了创造性和消灭了高层文化。而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则在于对流行东西的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现象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工具理性必须要有批判理性予以制衡。美国丹尼尔·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研究也向人们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一经失去了宗教苦行主义的束缚，它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的发展必然会畸形冒进、相互抵触；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后，世上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色彩。发展与变革即是一切。社会世俗化的副产品是文化上的渎神现象，资本主义更难以以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所谓的终极意义了。

诚然，商品社会、市场经济是个真正功利主义的世俗世界，它本身确有追逐利润的内在冲动和本质，倾向于冷酷无情的赤裸裸“现金交易”，彻底撕掉传统社会那温情脉脉的外衣，把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但在另一方面来说，对于商品、货币这样一些永恒变动并充满“形而上学神秘性”的现象，仅仅执着它那表面的物质外壳而不问其背后的实质，那也很难得真的叫作什么“实事求是”。我们知道，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使用价值，商品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价值；使用价值是物质实体，而价值则是社会关系。如果说使用价值的物质实体给人的满足总有其自然的限制，并倾向于使人的精神局限于极为狭窄范围之内的话，那么价值背后的丰富社会联系所促成的人类精神冲动，却往往是无限的。商品经济比自然经济有着更多的精神追求。商品、货币等等东

西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仅是其表面的物质载体，确实必须要也必然会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问题还在于任何社会关系又都有自己的活动条件和活动范围。而且从思想导向和社会制衡方面来说，那种所谓“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拜金主义，还有那毫无制衡的利己主义狂潮，也同样有可能腐蚀和瓦解这个市场经济体系本身。一个典型商品社会、市场经济那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是跟公正严明的法治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他们那世俗功利追求背后，又总有理想之光在闪现。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以物的关系来表现人的关系”，因而确实可以带来商品、货币“拜物教”现象。但这实际上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劳动异化”状态。它正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须克服、扬弃的。所以西方思想界从近代启蒙主义的“理性批判”一直到当代人文主义的“文化批判”，从来都是用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去支持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并由此进一步寻求其历史性的突破和超越。工业社会发展起来的“工具理性”，同时也有“目的理性”或“批判理性”去加以制衡。笔者以为，既然马克思当年早就科学地揭露了各种“拜物教”的秘密，那么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们，为什么仍然要让人们在思想上重新回到那“物支配人”的“拜物教”迷信中去呢？

必须指出，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中，本来是有形上超越追求的。我国古典神话中诸如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等所透露出来的消息，正是人类“以实求虚”那形上超越的本性。逐日、补天、填海、移山等等都是无法实现的虚幻追求，但我们的祖先却以一步一个脚印的“每天挖山不止”而逐步逼近。到了先秦时代，老子、庄子对现行生存方式合理性的深刻反思，孔子、孟子那“知其不可

为而为之”的惶惶追求，还有屈原那“死而不悔”的上下求索，一直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已”的真正脊梁。可惜这些东西在日后的发展中，日渐给那嘲笑“杞人忧天”的浅薄实用功利主义淹没和扼杀了。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大批儒生追逐利禄而使整个社会风气日趋僵化和衰微。道家理论对各种异化现象的深刻反思，也日渐变成了“以不争为争”的阴谋权术。印度佛教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则演变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进入天国的廉价门票。由此，“以虚求实”终于代替了“以实求虚”；为了达到卑微的个人目的，人们完全可以不择手段。现在笔者主张通过改革开放来扬弃更新民族文化以及重构重组民族精神，并不等于要从根本上抛弃和瓦解民族传统，走所谓“全盘西化”的道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但是这个民族发展的初始条件和制约条件，而且还是这个发展的主体本身，因而无法象破鞋烂袜似的可以随便扔掉。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传统本身的变革和扬弃来实现新生。笔者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从古至今连续下来绵延不绝的伟大文化，这是十分值得我们自己珍惜和骄傲的。它本身就具有与时俱进、唯变所适、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自我完善机制，具有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吊民伐罪、革故鼎新的自我更新传统。它一方面讲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又讲究柔顺宽厚、包容万物。整个中国文化都是阴阳相济、刚柔互补的，因而具有很强的应变适应能力。特别是在当今“技术异化”条件下，中国文化那“生生不已”的生命智慧和“以弱对强”的内源性多样化发展战略，也极富启发意义。现在问题在于怎样赋予它一些合乎时宜的社会历史内容，让它能通过现实的

社会机制去发挥真正的积极作用。为此，我们现在以批判意识去审视和反思这个传统，运用理性批判去继承和超越这个传统，可能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的正确途径。中国传统社会和相应的文化形态确实太古老了，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蒙上了很厚的历史积垢，必须通过革命的扬弃才能获得新生；而所谓扬弃传统，则恰好表明了它的解放和自由。

(三)

我们现在再把视野转回自己国家当前的现实。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胜利。而后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发生的种种失误，恰好又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毛泽东同志当年反复强调要“理论务虚”，现在看来并非全无道理。他曾用马克思主义去重新解释我们古老的“实事求是”格言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是主张超越眼前现实的“以实求虚”，而不是固守古老传统那执着现实的“以虚求实”。它的出发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事实，但它所追求的东西，却是这些事实背后那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律性”。毛泽东对理想社会执着不懈的追求，至今仍然引起我们极为深切的敬意。老人家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那些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确实是免不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他作为突破现实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那些即兴而发的“胡说八道”，其启发意义却真正是超越时空的。时下一些人在批评他“建立地上乌托邦”的可笑企图时，却把他那超越现实的执着追求也给否定掉了。这些人心目中的“实事实